

由陳垣《道家金石略》解析 宋真宗崇道的面向

楊雅筑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兼任助理教授

提 要

史書記載宋真宗是一位相當崇尚道教的君王，研究宋真宗崇道的學者，其引證的資料，不是史書、就是稗官，不是佛紀、就是道經，對於宋代金石資料幾乎沒有運用到，非常可惜。這些碑銘壁記，留存了千年以前的事跡，可以補史之不足，或證稗官之說，相當有參考價值。

北宋時興金石之學，其金石著作雖然無法確切統計，但流傳至今至少有二十九部，運用金石資料研究宋代史實，也就掌握了紙本之外文人士大夫活動的痕跡，不但增廣金石文獻的使用，也能校證史書的記錄。

陳垣所編的《道家金石略》保存了許多道教的金石文獻，屬於真宗時期的，共有十八篇碑文、壁記的整理。故筆者以陳垣《道家金石略》為研究對象，擷取其中與宋真宗朝崇尚道教相關的資料，開發另一個尚未觸及的視角，釐清宋真宗崇道的面向。

關鍵詞：陳垣 金石 宋真宗 道教

由陳垣《道家金石略》解析 宋真宗崇道的面向

楊雅筑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在北宋時代兩個崇道的高潮，一是在真宗時候，一是在徽宗時候。而宋真宗（968-1022）扶持道教在歷史上是有名的，他導演種種神人、天書下降的事蹟，以封禪、祀汾陰的舉動，加上建宮觀、禮遇道士、規劃祠祿制度，使得全國崇道的氣氛濃厚。

一般研究宋真宗的焦點多在澶淵之盟，這一個使宋朝每年必須向遼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的盟約，是一個讓真宗感到喪權辱國又無可奈何的和議，爲了平復這樣的屈辱，他多次上演天書降世、神人下凡的事蹟，鞏固自己受命的正統，維繫「民無二主」的態勢，一切都是神道設教的思量。

但在種種研究真宗崇道的論文中，引證的資料，不是史書、就是稗官，不是佛紀、就是道經，對於宋代金石資料幾乎沒有運用到，非常可惜。這些碑銘壁記，屢遭戰火，留存了千年以前的事跡，可以補史之不足，或證稗官之說，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尤其，根據學者的研究，北宋時興金石之學，朝廷和士大夫均熱衷于古代禮樂器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碑刻則是其中之大宗^①，宋代出現的金石著作雖然沒

① 路遠：〈北宋時期碑林藏石考述〉，《文博》第6期（1996年），頁59。

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流傳至今的仍有二十九部之多^②，而宋代帝王和官府大力搜求古物，使得石刻的收錄與研究正式成為一門學科。^③於是運用金石資料來做宋代學術研究，也就掌握了當時文人士大夫在紙本之外的事跡。而陳垣所編的《道家金石略》保存了許多道教的金石文獻，屬於真宗時期的，共有十八篇碑文、壁記的整理，對於研究宋朝的道教，十分方便。

故筆者以陳垣《道家金石略》（以下簡稱《金石略》）為研究範圍，擷取其中與宋真宗朝崇尚道教相關的資料，以透顯研究宋真宗崇道，一個尚未開發的視角。

二、天書與神人的下降

宋真宗夢見神人相告，說是天書即將降臨人世，所以真宗蔬食齋戒，建道場于朝元殿，果然獲得天書一封，故大赦天下，將年號由景德改為大中祥符，從此開始了一連串崇道的舉動。〈改大中祥符元年赦〉：

朕欽承命麻，思惠黎元……期臻太和，荷上帝之眷懷，啟靈心而降鑒，燭祥輝於寢殿，神告先期，肅清醮於齋壇，天垂寶籙，祇膺景貺，躬受丹書，所期純嘏以及人……仰答高明，虔增錫瑞之名，用易紀年之號，式均大賚，並洽洪休，可大赦天下，改景德五年為大中祥符元年。^④

這一份文件詳細記載了真宗建醮、領受天書、大赦天下、更改年號的始末。

天書降臨之後，真宗又創造了神人下凡的奇事，他對臣下敘述，夢有神人傳話天帝將命趙氏之祖下凡，授予天書，其後果然有天尊與其他六位神人下降，自稱是九位人皇之一，也是趙氏的始祖，願真宗善為撫育蒼生云云，真宗藉此製造

② 李菁：〈宋代金石學的緣起與演進〉，《中國典籍與文化》第3期（1998年），頁63。

③ 趙超：〈中國古代石刻的著錄情況〉，《中國典籍與文化》第2期（1995年），頁27。

④ （宋）宋綬、宋敏求編：《宋大詔令》（臺北：鼎文書局，1972年9月），卷2，頁6。

了一個趙姓的神明，喚名趙玄朗，從此「玄」、「朗」二字都要避諱。

所以「天書」與「神人」按照時段應該區分為二件事，但天書下降之前，真宗曾夢見神人預告未來，所以二件事不可分割。茲將二事在金石碑記中的記錄一一梳理如下。

（一）天書下降

真宗朝的天書下降，共有四次，乃所謂的「承天門天書」、「大內天書」、「泰山天書」和「永興天書」，前三者合稱「祥符天書」，後者又稱「朱能偽天書」^⑤，因「朱能偽天書」是臣下媚上而偽作的^⑥，不屬於真宗崇道的設置，故不予討論。此處先將史書與金石碑記對「祥符天書」的記述，做一個比對：

1. 承天門天書：

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帝謂輔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道，封處有字隱隱，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⑦

《宋史》清楚地記載「承天門天書」事發之後，宋真宗詳細轉述，不但年月時日俱全，神人的形貌、交代的事項、天書下降的情狀均異常清晰。只是神人夢中相告這等奇事，為何不與輔臣相議，這一點在第二次天書下降的記載才有了解釋。

⑤ 唐代劍：《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8月），頁11-12。

⑥ 朱能偽天書之事，可參見（宋）楊仲良：《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24，頁713-735。以下簡稱《長編記事本末》。

⑦ （元）脫脫：《宋史·禮志》（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卷140，志57，禮7，頁2539。

2. 大內天書：

《宋史》載：「四月辛卯朔，天書再降內中功德閣。^⑧」其中有關於大內天書的描寫，僅僅是二句而矣，相較於承天門天書和泰山天書的記錄大不相同，非常簡略，當時的情狀、天書的樣貌、在場之人都沒有任何的敘述，僅僅知道時間為四月，地點為大內的功德閣。

3. 泰山天書：

帝御崇正殿，趣召輔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鄉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宜齋戒祇受。』朕雖荷降告，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朕今得其奏，果與夢協。上天眷佑，惟懼不稱。」……己亥，迎導天書，安於含芳園之正殿。辛丑，帝致齋。翼日，備法駕詣殿再拜受，授陳堯叟啟封。^⑨

先是五月丙子，上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復當賜天書于泰山。」即密諭王欽若奏，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吏王居正，居正見其上御名，馳告欽若，欽若等就取得之，遂建道場，明日跪授……授陳堯叟，跪讀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賜樂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曆遐歲。」^⑩

第三次接獲天書的始末非常詳盡，加上這次的演出不再只有真宗一人，也加入了早就知情的王欽若、發現天書的木工董祚、以及王居正等等，「秘守斯言，善解吾意」等天書文句，再次為真宗密而不宣的行為做出詮解。

《金石略》亦記錄了天書下降的狀況：

⑧ （元）脫脫：《宋史·禮志》，卷 140，志 57，禮 7，頁 2539。

⑨ 同前註。

⑩ （宋）楊仲良：《長編記事本末》，卷 69，頁 667 右上-左上。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書降大內左承天門，大赦改元，東京賜酺五日，天下賜酺三日，以左承天門為左承天祥符門，以正月三日為天慶節，其夜燃燈，許士庶遊看，休假五日。節前七日左承天祥符門及天下建道場設醮，前後各三日斷屠宰，禁刑罰，改開封府浚為祥符縣。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泰山，降處建天貺殿，以六月六日為天貺節，休假一日，節前七日本殿建道場設醮，節日天下建道場設醮，詔東京建玉清昭應宮，天下置天慶觀。¹¹

《金石略》異於史書的是，行文不從天書下降的源起開始書寫，而是直接記錄天書下降之後種種變動與慶祝的狀況，按照《金石略》的記錄，「承天門天書」在正月三日下降，大赦改元、賜酺、改門名、訂天慶節、燃燈許士庶遊看、齋戒禁罰、變更縣名。六月六日天書再降，訂天貺節、建道場設醮、置天慶觀。則第二次的天書下降（大內天書），彷彿沒有發生過一般。但《宋史》補足了這個缺口：

諸慶節，古無是也，真宗以後始有之。大中祥符元年，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為天慶節，休假五日，兩京諸路州、府、軍、監前七日建道場設醮，斷屠宰；節日，士庶特令宴樂，京師燃燈。又以六月六日為天貺節，京師斷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宮。又以七月一日聖祖降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日為降聖節，休假、宴樂並如天慶節……天禧初，詔以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天書再降內中功德閣為天禎節，一如天貺節。尋以仁宗嫌名，改為天祺節。¹²

《宋史》歷數天慶節、天貺節、先天節、降聖節，可以看出這所有的節日都是為了紀念和慶祝「承天門天書」與「泰山天書」的下降，有趣的是，大內天書在大

¹¹ （宋）趙恆：〈天慶觀碑〉，陳垣：《道家金石略·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9月，《陳援菴先生全集·四》），頁483-484。本書所引金石資料，多出於此書，故以下簡稱《金石略》，且為求行文簡潔，版本冊數皆據此條，不再贅述。

¹² （元）脫脫：《宋史》，卷112，志65，禮15，頁2680-2681。

大中祥符年間並沒有任何的慶祝活動，反而是事隔十年，宋真宗再次改變年號，由大中祥符改元為「天禧」，才下詔為「天禎節」，其後又因避諱宋仁宗趙禎的名字，改為「天祺節」，至於「大內天書」的慶祝何以推遲如此之久，至今仍是謎團。

《金石略》中描寫天慶節和天貺節時，將禁刑罰、改縣名之事一體說明，而史書的記載則需要相互參看，才能有完整的概念，相形之下，《金石略》的資料，多了賜酺、改門名縣名等等記錄，較為詳晰，但事隔十年之後天禎節，只有史書保存了紀錄，在金石資料則付之闕如。

（二）神人降臨

真宗繼天書下降之後，意猶未盡地導演了「天尊降臨」之事，為自己授命於天，承繼大統的理路不停地造勢，這次的事件在《宋史》之中有詳盡的說明：

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靈仙儀，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陞升，見侍從在東陞。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即召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布告天下，命參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與禮官修崇奉儀注。閏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¹³

¹³ （元）脫脫：《宋史》，卷140，志57，禮7，頁2541。

此事《長編》亦有記載¹⁴，內容大致相同，真宗敘述自己在夢中接獲指示，玉皇命趙氏的先祖傳授天書予宋真宗，爾後這位趙氏先祖再度托夢約定下凡的日程，命真宗多設六席恭候，到了約定的日期，先有異香傳出，繼而黃光滿室，天尊與六位侍從降臨，對真宗敘述趙氏一族的譜系，願皇帝善撫蒼生後乘雲離去，宰相王旦帶領大臣恭賀皇帝，布告天下，為神人上尊號，設醮祭告。

相形之下《金石略》的記錄少了天尊下降的情狀，但多了日期以及與民同樂的記載，並且勾合各種節慶日期的設置，明晰了節日的由來：

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延恩殿，皇帝親奉聖旨：「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有功於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今於後唐時奉玉皇命，七月一日降下，總治下方，管勾趙氏之族，已一百年。」又云：「吾生於壽丘，吾治世至今還遠，只以今來下界日為生日。」次日大赦天下，東京賜酺五日，諸道賜酺三日，改延恩殿為真游殿，以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七月一日為先天節，節夜並燃燈，許士庶遊看。¹⁵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聖祖九天司命天尊降延恩殿，宣差入內侍省內侍高品、楊永貴於安天元聖帝廟並真君觀請道士二七人、僧二七人起建道場，各三晝夜，於閏十月十七日開啟，至二十三日罷散，故記之。¹⁶

在神人下降的記敘上，史書與《金石略》雖然大致相同，但缺乏了日期的記敘，則因此而產生的「降聖節」，無法確實證成是神人下降的日期、「先天節」是趙氏天尊的生日也無由得知，其後的大赦天下、賜酺燃燈、建道場頌經三日的盛況，也只有金石資料中保存了下來，足見金石資料真的是補足史料的好幫手。

¹⁴ （宋）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卷 79，頁 760 左上-左下。

¹⁵ （宋）趙恆：〈天慶觀碑〉，陳垣：《金石略》，頁 484。

¹⁶ 不著撰人：〈北嶽安天王廟建道場記〉，陳垣：《金石略》，頁 478。

三、道士、宮觀與道藏

宋真宗禮遇道士、大修宮觀，這些推廣道教的措施，是為提昇中原本土的信仰，是以真宗有意識地壓抑其他的宗教，「軍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滋甚¹⁷」、「君臣事跡，崇釋教門，有布發于地，令僧踐之……此乃失道惑溺之甚，可并刊之。以徼福門¹⁸」，將佛教比為「外教」，過於崇佛比為「失道」，深具維護中原本土宗教，便於神道設教的意識形態。在金石資料之中，真宗朝關於道士、宮觀與編纂《道藏》的記載也非常之多。

（一）優禮道士

真宗與道士間的交往頻繁，常御賜道號，多帶有「貞」字，如泰山隱士秦辨，賜號「貞素先生」；敷水隱士鄭隱，賜號「貞晦先生」；道士張正隨，賜號「貞靜先生」等等。真宗朝的道士，在金石中較為特殊的是對賀蘭棲真的記載。其他常是姓名的記錄，多為主持醮祭的道士。

敕賀蘭棲真：汝棲身岩壑，抗志煙霞，觀心眾妙之門，脫屣浮榮之外。朕奉希夷而為教，法清淨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為之理。久懷上士，欲覲真風，爰命使臣，以禮徵聘。¹⁹

這篇御敕亦存於《宋史》，僅末二句做「爰命使車，往申禮聘」²⁰，有所不同，而《宋大詔令》於文末尚有「師且暫別林谷，來儀闕庭，必副招延，無憚登涉，今遣人入內高品、李懷贊召師赴闕，想宜知悉。」²¹可見一個歷史事件的完貌，史

¹⁷ 《長編記事本末》，卷 65，頁 625 左下。

¹⁸ 同前註，卷 67，頁 649 右上。

¹⁹ （宋）汪仲詢撰：〈賜賀蘭棲真敕書并贈詩序碑〉，陳垣：《金石略》，頁 458。

²⁰ （元）脫脫：《宋史·方技傳》，卷 462，頁 13515。

²¹ （宋）宋真宗：〈召河陽濟源道士賀蘭栖真詔〉，（宋）宋綬、宋敏求編：《宋大詔令》，卷 223，頁 861。

書、金石、詔令的記載均有增減，想掌握一個全面的視域，各種資料均不可偏廢。例如《宋史·賀蘭棲真傳》：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鄽，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景德二年，詔……既至，真宗作二韻賜之，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²²

寫出了賀蘭棲真百歲之時，仍不畏寒暑，善吐納之術，所以常常不食五穀而不饑，但有時候也任性恣意，常遊走街市，狂飲縱酒。真宗召見，非常寵愛，賞賜無數，併免田租。而《金石略》對賀蘭棲真的記載則是：

賀蘭棲真者，譙國人也，始事驪山白鹿觀馮洞元。洞元沖寂，復訪道於終南，結茅於岩曲。未載紀，思得福地以毓其真，於是乎遊王屋□濟源流之奉仙，即唐小睿真人舊隱之所也……先生小節靡拘，至真不染，深於莊、老，尤善辟谷，吐故納新，稚顏鴉鬢，而常獨住天壇。²³

較之《宋史》傳記，《金石略》著重其人訪道的行蹤和性情，籍貫、形貌的書寫均較為具體。另一篇碑文則記載了宋真宗與賀蘭棲真的交遊：

景德初，真宗皇帝以四海大寧，萬機豐暇，詢訪奇妙之士，用資恭默之誠。聞其（賀蘭棲真）素風，渴其全德，二年秋九月，遣中使馬蒲輪，賚鶴板而召之。先生識探幾萌，道臻妙本……未幾請還，上許之，寵以蘭袍，旌以□□，著七言以賜之，增重幣以將之。²⁴

²² （元）脫脫：《宋史·方技傳》，卷 462，列傳第 221，頁 13515-13516。

²³ （宋）汪仲詢撰：〈賀賀蘭棲真敕書并贈詩序碑〉，陳垣：《金石略》，頁 459。

²⁴ 同前註，頁 460。

此文描寫真宗對賀蘭棲真的寵幸，與《宋史》不同的是，多了召見的緣由，並且詳細地記敘年月，完備了《宋史》的不足。

（二）修建宮觀

真宗廣修宮觀，自有其提振道教的現實意義，其中最著名的，正是修葺玉清昭應宮以爲供奉天書之所，《宋大詔令》之〈來年正月一日上玉皇聖號有事南郊恭謝之禮詔〉記載：

（真宗）爰於前歲，特發精衷，式瞻霄極之尊，虔上帝真之號，仍期奉冊，別擇吉年，屬明律之再更，果揆辰而有得，今以來歲元月，適叶上辛……報高明洪覆之恩，謹以來年正月玉清昭應宮，與天下臣庶恭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寶冊，重念獲契隆平，荐臻豐楙，慶歡樂之普洽。²⁵

《續資治通鑑長篇》云：「作玉清昭應宮尤精麗，小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其費²⁶。」《宋史》也載：「大中祥符元年，詔建宮以藏天書。七年，宮始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²⁷。」此次興建宮觀，惟《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紀》記載最詳。²⁸營建宮觀的鋪張奢華，引來朝臣的非議，如張耆：

（張耆）從帝東封，遷絳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時建玉清宮，耆奏疏謂殫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遷相州觀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²⁹

張耆看見玉清宮過度奢靡，忍不住上奏諫言，竟因而由軍侯貶降爲副指揮使，可見宋真宗一系列天書神人的崇道模式，是不容朝臣非議的。《金石略》也透露了

²⁵ （宋）宋綬、宋敏求編：《宋大詔令》，卷118，頁402。

²⁶ （宋）畢沅：《續資治通鑑》（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卷31，頁1左。

²⁷ （元）脫脫：《宋史·五行志》，卷63，志第16，頁1377。

²⁸ （宋）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卷18，頁507-532。

²⁹ （元）脫脫：《宋史》，卷490，列傳第49，頁9710。

當時大臣對此事的不安：

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輓楠，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雲役軍匠，寧免煩擾乎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今者方畢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歛之維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眾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鄣，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臣謹按孟夏無發大眾，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下築衝冒鬱蒸傲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癘雷電迅風，坼木飄瓦，溫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與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誠，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剏闢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³⁰

文中指出不便之事有五，一為搬運巨木，不但有傷人力，而且擾民；二為耗損資財，浪費公帑；三是兵士致力於工事，防賊保駕，缺乏人力；四為孟夏施工，違於時節，難免雷電迅風之災；五是建設玉清昭應宮工麗精巧，惟恐不得天心云云。

然而真宗既是為了神道設教而崇道，對於這種忠言，已經無暇顧及，《金石略》又顯示，他對於興建道觀之事愈加狂熱：

宜令逐路轉運司，遍行指揮轄下州、府、軍、監、關、縣等，內有全無宮觀處，相度於系官空閑地內，破系省錢及系官人匠物料等，漸次建道觀壹

³⁰ (宋)王曾：〈諫作玉清昭應宮〉，陳垣：《金石略》，頁465。此文亦收於(宋)呂祖謙：《宋文鑑》(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2月)，卷43，頁2左-6右。

所。³¹

本文在分析天書的段落已提到，第三次天書下降之後，真宗「詔東京建玉清昭應宮，天下置天慶觀³²」，由是宮觀遍及各省。陳垣對於此篇碑文按語特詳：

碑所刻者即二詔之詞，史皆云詔，實則敕。真宗君臣矯飾祥瑞，塗民耳目，以掩澶淵之恥，孫奭諸疏已斥其妄，此碑詳錄當時崇奉事實，而無一語贊頌，蓋亦有識者所為。³³

「詔」的意義與「敕」雖然很相近，但「詔」具備告誡、教導的溫和，相形之下，「敕」的命令性質比較嚴格，陳垣「史皆云詔，實則敕」，正好點明碑文足匡正史傳之誤，就此處而言，此碑之存在，更接近民間感受的現實。

因為真宗對於宮觀一事不遺餘力，臣下也以建修宮觀為業績，大興土木，《金石略》中即有記載：

望以二年春由太學登甲科，筮仕之初，出宰茲邑，承郡命，秉詔旨，轄匠篤民，修其三殿：曰玄元，曰三清，曰三皇。功就而未遑紀其事。³⁴

韓望修慶唐觀，並著於碑石，即顯明了真宗一朝，上行下效的崇道之風。據學者考證，四川有南山三清洞，其中第五號的清宮古洞窟之道教石刻，是現今所能見到的中國宗教史上最早的道教神系組合造像，石門山有村經府洞中第十號的三皇古洞窟，亦有精美的道教神像。³⁵二處均為宋代道教遺址，可與此處所言「三清

³¹ （宋）趙恆：〈天慶觀碑〉，陳垣：《金石略》，頁 485。

³² 同前註，頁 483-484。

³³ 陳垣：〈建天慶觀敕·按語〉，陳垣：《金石略》，頁 485-486。

³⁴ 韓望：〈慶唐觀碑銘并序〉，陳垣：《金石略》，頁 464。

³⁵ 黃海德：〈中國西部古代道教石刻造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第 1 期（1994 年），頁 96-97。

殿」、「三皇殿」互相參看。金石資料也透顯了當時宮觀的樣貌，如：

揆之以日，作於此宮，除舊創新，闢小為大，工無巨細，罔不經心，人之悅從，匪懈其力。東西廣七十五步，南北長七十五步，中建三清殿七間，東廂三官堂鎮樓暨玉局祠屋，西廂九曜堂、太宗皇帝御書樓並齋廳廚庫門屋，周回廊宇，共一百三十五間。³⁶

因宋真宗朝所建宮觀之富且眾，在中國的歷史上甚為鮮見，不但將道教信仰深深烙印在當時的歷史，連帶影響了宋朝文學中對宮觀的形容³⁷，使得宋代道教文學的作品更為豐富而寫實。

（三）道藏的編纂

五代道籍散佚，宋太宗開始搜集道經，真宗命人校定經典，又命張君房（?-?）等整理道籍，九年而成，賜名《寶文統錄》，張君房撮其要為《雲笈七籤》。³⁸

根據《雲笈七籤·序》，真宗「盡以秘閣道書、太清寶籙，出降于余杭郡，俾知郡故樞密直學士戚綸、漕運使今翰林學士陳堯佐，選道士冲素大師朱益謙、馮德之等專其修較，俾成藏而進之³⁹」，可見得真宗對《道藏》的纂修，用力甚勤。金石資料之中也收錄了夏竦（985-1051）所撰的〈重建道藏經記〉：

唐景雲（710-711）中，天子為司馬承禎置觀桐柏，界瓊臺三井之下。五代相競，中原多事，吳越忠懿王得為道士朱霄，朱外新之，遂築室於上清閣

³⁶ （宋）彭乘：〈修玉局觀記〉，陳垣：《金石略》，頁488。

³⁷ 關於宋代道教文學中描寫宮觀的研究，可參見蔣安全：〈宋代道教文學芻論〉，《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4期（1995年12月），頁8-9。

³⁸ 任繼愈：《中國道教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年3月），頁513。

³⁹ （宋）張君房輯：《雲笈七籤·序》（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9月），頁1。

西北，藏金錄字經二百函，勤其事也……至雍熙二年，有詔悉索是經付餘杭，傳本既畢，運使諫議大夫雷公德祥命舟載以還，從師請也。又十載，藏室幾壞，虞於風雨……又十三載，會國家獲瑞命於承天門，建封禪之議，有詔改賜觀額為崇道。越明年，天子感三篇之事，築玉清昭應宮於京師，制詔天下，訪道士之有名行及仙經之有尤異者，郡籍師等名馳驛上之……於是靈編秘牒，金簡玉冊，有太上正一品練形飛步之術，熊鳥赤白丹石圖籙之法，總而謂之曰經，聚之於室曰藏。⁴⁰

根據黃海德的考證，本文為夏竦二十六歲時的作品，敘事清楚，行文流暢，釐清了司馬承禎生平、桐柏觀的歷史意義……等多種道教研究的議題。⁴¹此篇敘述了自唐而北宋真宗，《道藏》的收藏損益的狀況，日期、卷數、參與人員，所遇到的周折，最後成冊的樣貌，都歷歷詳數，可謂《道藏》成書的重要資訊，由是亦可看出真宗對道籍的重視，然而這篇〈重建道藏經記〉並沒有被收錄任何文集，僅存於金石資料，其後於元人所編之《天臺山志》與《道藏》均有轉載，若非金石資料保留了這篇作品，歷代修治《道藏》的始末就缺少了這份珍貴的一手資訊。

四、祈福禳災

宋代皇室重文輕武，根據「國之大事，在祀與戎⁴²」的傳統下，對於國家祭祀禮儀，十分注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在沿用儒家祭禮的同時，也吸收了道教齋醮科儀，融入郊祀大禮之中。《東京夢華錄》曾記載郊祭的情況，敘述祭壇上「有登歌道士十餘人，列鐘磬二架，餘歌色及琴瑟之類⁴³」，可見當時的郊祭浸

⁴⁰ （宋）夏竦：〈重建道藏經記〉，陳垣：《金石略》，頁473。

⁴¹ 黃海德：〈天台《道藏》考記——有關夏竦《重建道藏經記》的幾個問題〉，《宗教學研究》4期（2003年），頁1-10。

⁴² 語出《左傳》成公十三年，參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12月，《十三經注疏》），頁460。

⁴³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43。

染了濃重的道教色彩。而宋代太宗、真宗、徽宗熱衷為金籙齋醮撰寫詞文，《金石略》收錄真宗的〈御製觀龍歌并序〉⁴⁴，即為一例。由皇帝提筆撰寫齋醮詞文，這在中國古代的帝王中，唯有趙宋皇帝最為突出。⁴⁵

宋真宗所進行封禪、祀汾陰，其實是緣自於儒家的傳統而來的⁴⁶，但天書、聖祖降臨和種種恭謝天地的儀式，卻又與道教脫不了干係。《宋史·禮志》：

初，禮官言無帝王親習之文，帝曰：「朕以達寅恭之意，豈憚勞也。」既畢，帝見禮文有未便，諭宰臣與禮官再議。於是詳定所言：「按開寶禮，則燔燎畢封冊；開元故事，則封後燔燎。今如不對神封冊，則未稱寅恭，或封後送神，則併為諠瀆。欲望俟終獻畢，皇帝升壇，封玉匱，置匣中，泥印訖，復位，飲福，送神，樂止，舉燎火。次天書降，次金匱降。禮儀使奏禮畢，皇帝還大次，俟封畢，皇帝再升壇省視。緣祀禮已畢，更不舉樂。省訖，降壇。」仍詔山上亞獻、終獻，登歌作樂。⁴⁷

由此可見，天書下降之後，全國上下崇尚道教，連禮官也不得不修改儀式，詳擬了一種兼具儒家禮教與道教科儀的接文儀典。再者，真宗的崇道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所以公開聲稱，其崇道的目的是為了保國安民，對燒丹鍊藥毫無興趣，而在祈福禳災上，反而動作頻繁⁴⁸，正中紀昀所形容的「道家言祈禳，佛家言懺悔⁴⁹」的形象。

⁴⁴ 陳垣：《金石略》，頁473。

⁴⁵ 張澤洪：《道教神仙信仰與祭祀儀式》（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年1月），頁91-92。

⁴⁶ 封禪、祀汾陰緣於儒家的論點推演，可參見劉靜貞：〈權威的象徵——宋真宗大中祥符時代（1008-1016）探析〉，《宋史研究集》第23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2月），頁47；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年4月），頁129。

⁴⁷ （元）脫脫：《宋史》，卷140，志57，禮7，頁2530。

⁴⁸ 任繼愈：《中國道教史》，頁514。但另一說認為宋真宗雖然表明不敢沈溺方術，但其實私底下頗好外丹黃白術，證據是《宋史·夏侯嶠傳》，頁9758。其中記載，真宗有服食金丹的記錄。

⁴⁹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39。

根據張澤的解釋：「祈，是祈求福佑；禳，是禳除災禍，在道教各種齋醮科儀中，都有特定的祈禳功能。」⁵⁰《宋大詔令》中〈來年正月一日上玉皇聖號有事南郊恭謝之禮詔〉也有祈福南郊的記載：

謹於正月十一日有事于南郊，行恭謝之禮，諸軍賞賜，並以內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帛，諸州軍監無得以修貢助為名，輒有率歛，務從簡約，無至煩勞，凡百有司，各供其職。⁵¹

雖說要官民「務從簡約，無至煩勞」，但未必真能如此，從《宋史》記載真宗祀后土時，出派各種職務的繁複就可以看出⁵²，在真宗有心護教的指導下，各式科儀根本無法「簡約」。

（一）祈福

根據學者的考證，「封與禪原本都是向山神、地神祈願的咒術」⁵³，真宗先是藉天書之瑞為名，舉行封禪，接著又以祭天不祀地，惟恐失對偶之義，而至汾陰祀后土。雖然他在詔書中說到：「朕之是行，昭答元貺，匪求僊以邀福，期報本而潔誠。」⁵⁴表示了這次封禪的重點，在昭示萬民（包括遼人），趙宋受命於天。但此後各個地區均不甘寂寞，請真宗降臨當地祀地，這不但是上有所好、下必甚

⁵⁰ 張澤洪：《道教神仙信仰與祭祀儀式》，頁375。

⁵¹ （宋）宋綬、宋敏求編：《宋大詔令》，卷118，頁402。

⁵² （元）脫脫：《宋史》，卷140，志57，禮7，頁2534-2535。真宗東封之又明年，河中府言：「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列狀乞赴闕，請親祠后土。」詔不允。已而，南又請，河南尹寧王元偓亦表請，文武百僚詣東上閤門三表以請。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后土，命知樞密院陳堯叟為祀汾陰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之，樞密直學士戚綸、昭宣使劉承珪計度發運，河北轉運使李士衡、鹽鐵副使林特計度糧草，龍圖閣待制王曙、西京左藏庫使張景宗、供備庫使藍繼宗修治行宮、道路，宰臣王旦為大禮使，知樞密院王欽若為禮儀使，參知政事馮拯為儀仗使，趙安仁為鹵簿使，陳堯叟為橋道頓遞使。

⁵³ 劉靜貞：〈權威的象徵——宋真宗大中祥符時代（1008-1016）探析〉，頁47。

⁵⁴ 《長編紀事本末》，卷68，頁660右上。

焉的表現，也是人民相信祀地能夠祈福，而帶來的祀地熱潮，《長編記紀事本末》中就說明了這些狀況。⁵⁵而《宋史》亦有記載，如：

及祀汾陰，命陳堯叟祭西海，曹利用祭汾河。車駕至潼關，遣官祠西嶽及河瀆，並用太牢，備三獻禮。庚午，親謁華陰西嶽廟，臣陪位，廟垣內外列黃麾仗，遣官分奠廟內諸神，加號嶽神為順聖金天王。還至河中，親謁奠河瀆廟及西海望祭壇。⁵⁶

如此大陣仗的東奔西跑，群臣陪列，遣官分奠，可以看出真宗朝對於祈福的熱衷程度，而金石中所記的祀地則有：「大中祥符四年，帝祀后土於汾陰，駕至函谷關，制文勒石。⁵⁷」相形之下，簡約了許多，此文出於〈老子度關銘〉，《玉海》載為真宗御制，但不見此文，而《金石略》卻保存了這份文獻，彌足珍貴。又：

□□內侍省□侍殿頭李懷□，奉宣將祀汾陰為軍民祈福。於西嶽廟內□拜□啟道場七晝夜，□日設醮一座。至丁□日禮畢，次日東行□闕。⁵⁸

雖然字跡漫漶難辨之處甚多，但隱約可見當時的狀況，從道場、設醮等文字來看，祀汾陰這個儒家傳統，在北宋真宗時，其實是以道教的方式來進行的。以往政治上取得繼承權，開國君主往往謁泰山、祀汾陰，宣示正統，而今宋真宗既非開國君主，治下也無甚功績，只好以「為軍民祈福」為理由，勒於碑石，不僅圓滑地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也明示了濃厚的道教色彩。

⁵⁵ 《長編紀事本末》，卷 19，頁 540-562。

⁵⁶ （元）脫脫：《宋史》，卷 120，志 55，禮 5，頁 2486。

⁵⁷ （宋）一虛叟：〈老子度關銘并四子贊〉，陳垣：《金石略》，頁 476。

⁵⁸ （宋）龐奎：〈華嶽廟題記〉，陳垣：《金石略》，頁 457。

（二）禳災

有了「祈福」，就會有「禳災」，祈福是在平安無事的時候祈求更加順遂的道教科儀，在祈願的同時，常伴隨「禳災」，目的是預防或終止災禍的發生。在金石之中也保存了宋真朝以道教儀式禳災的記敘。

皇宋大中祥符二年，歲次己酉，十月壬午朔，二十九日庚戌，入內內侍省□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張永和奉宣為晉國大長公主祈福，特詣西嶽廟請
道士二七人，悟真大師賈得升、張德升……修建消災靈□道場，□□□□
□□□□大醮壹座，至十一月三日罷散。又至四日，晉國大長公主自□
銀二錠，別建靈寶道場三晝夜，亦設大醮壹座。□刊石為志。⁵⁹

資料中清楚陳列這個消災道場建立的源起，是為晉國大長公主祈福禳災，從道士、法師的數量和進行的天數來看，較之於前述《東京夢華錄》所載郊祭，更為盛大。晉國大長公主指的是延慶公主，《宋史》載：

開寶五年，封延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石保吉。太宗即位，進封許國，淳化元年，改晉國。真宗初，進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進大長公主。薨，賜謚賢靖。⁶⁰

陳垣亦考證出：「此碑始因公主病劇，遣內侍張永和設醮西嶽，有此題記也。⁶¹」可見這一次的消災道場的建置，主要是為了禳災，希冀祛除公主的病痛。另有一則，是為韓國長公主祈福禳災的金石資料：

⁵⁹ （宋）李知常：〈晉國大長公主設醮題記〉，陳垣：《金石略》，頁471-472。

⁶⁰ （元）脫脫：《宋史·公主列傳》，卷248，列傳第7，頁8772。

⁶¹ 陳垣：〈晉國大長公主設醮題記·按語〉，陳垣：《金石略》，頁472。

大中祥符三年，歲在庚戌，三月庚辰日丙戌，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張懷則□宣為韓國長公主□消災祈福於西獄廟，請道士二七人，修建靈寶道□三晝夜。散日，設五嶽謝恩大醮一□□□刊於石□記。靈台觀悟真大師賈得升題。（第一截）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張懷則為韓國公主疾愈，丞□再來禱謝嶽靈。請道士二七人開啟靈寶道場三晝夜，散日設清醮壹座。行事禮畢而退。時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八日。悟真大師賈得升題記。（第二截）嘉祐四年三月初五日，入內內侍省內高品張恭禮奉聖旨於□岳門□□□□七晝夜，請道士二七人。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刊石記之。⁶²

根據張澤洪的說法：「齋醮法壇是祭祀神仙的神壇，道教崇祀的三界神真，都要禮請到壇，各路官將吏兵都要彙聚壇場。尤其舉行大型齋醮法會，設置的聖真班位更是集神仙之大成。⁶³」所以有大至三千六百分聖位的，最少也供奉六十分位，根據齋事大小而增減，而為韓國長公主，設醮二百四十分位，即是禮請三界神真的科儀規範。

五、結語

宋真宗崇道活動十分繁複，由製造天書神人事件展開，漫延封泰山、祀汾陰、興宮觀、敬道士、設科儀、輯道書，乃至新興節日的訂定等等，也使得不論宮庭或民間，都熱衷以道教的儀式祈福禳災，大小官員都必須配合奉侍天書的活動，時不時興建、修葺、管理道觀，禮遇道士，設醮祝禱。

《金石略》的資料，自有其記敘的角度，例如在天書與神人事件，金石資料將後續訂定節日、禁刑罰之事合攏陳列，並且保存了賜酺等等史料未曾提及的事件，一如〈賀蘭栖真碑文〉能補史之不足一般，展現史書未能傳述的視角。

在修宮觀之類的記錄上，史書站在皇權與政治的方向記錄史實，而金石的資

⁶² 不著撰人，（宋）賈得升題：〈韓國長公主祈福記〉，陳垣：《金石略》，頁474-475。

⁶³ 張澤洪：《道教神仙信仰與祭祀儀式》，頁359-360。

料卻揭露了臣下的不安，也透顯了官員增修宮觀以為業績的事實，對於研究當時崇道現象有極大的助益。

《金石略》之中〈重建道藏經記〉更是研究道教史的重要材料，是研究《道藏》的一手資料；史傳中付闕的公主事跡，也可在金石資料之中找到相應的痕跡。足見金石資料有證史、補史的功用，實用價值極高，可惜現今學界珍視、保存、開發研究金石資料的人才並不多見，是以筆者不揣鄙陋，以宋真宗一朝為研究視域，期待日後有更多的研究者，能更加善用金石之中所有的文獻。

徵引書目

（一）引用古籍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12月，《十三經注疏》）。

（宋）宋綬、宋敏求編：《宋大詔令》（臺北：鼎文書局，1972年9月）。

（宋）張君房輯：《雲笈七籤》（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9月）。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宋）呂祖謙：《宋文鑑》（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2月）。

（宋）畢沅：《續資治通鑑》（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

（宋）楊仲良：《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二）引用現代出版專書

任繼愈：《中國道教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年3月）。

唐代劍：《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8月）。

張澤洪：《道教神仙信仰與祭祀儀式》（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年1月）。

陳垣：《道家金石略》（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9月，《陳援菴先生全集·四》）。

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年4月）。

(三) 引用論文

1. 期刊論文

李菁：〈宋代金石學的緣起與演進〉，《中國典籍與文化》第3期（1998年），頁63-68。

黃海德：〈中國西部古代道教石刻造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1994年），頁93-103。

黃海德：〈天台《道藏》考記——有關夏竦《重建道藏經記》的幾個問題〉，《宗教學研究》4期（2003年），頁1-10。

路遠：〈北宋時期碑林藏石考述〉，《文博》第6期（1996年），頁59-69。

趙超：〈中國古代石刻的著錄情況〉，《中國典籍與文化》第2期（1995年），頁25-33。

蔣安全：〈宋代道教文學芻論〉，《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4期（1995年12月），頁8-13。

2. 論文集論文

劉靜貞：〈權威的象徵——宋真宗大中祥符時代（1008-1016）探析〉，《宋史研究集》第23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2月），頁43-70。

**Analyzing Emperor Zhenzong's
advocacy for Taoism with
“*The Collection of Taoist Epigraphy*”
(*Dao jia jin shi lue*) edited by
Yuan Chen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

Yang, Ya-Ch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eral education Adjunct,
Shih Chien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Emperor Zhenzong of Song was very fond of Taoism. Most scholars studied Emperor Zhenzong of Song's advocacy for Taoism based on historical books, anecdotes, and Buddhist or Taoist scriptures. Nevertheless, it is a pity that epigraphic sources of Song have yet to be applied. These epigraphic sources preserve the tracks over a thousand years. They provide enormous value as useful supplements to historical books and anecdotes.

The studies of epigraphy have developed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exact number of epigraphic documents is unknown. Yet there are 29 documents circulating till nowadays. These epigraphic documents preserve additional tracks and provide historical materials other than those written on paper materials.

“*The Collection of Taoist Epigraphy*” edited by Yuan Chen preserves many

epigraphic documents of Taoism. Among these documents, there are 18 stone inscriptions and wall inscriptions from the period of Emperor Zhenzong. The author therefore uses “*The Collection of Taoist Epigraphy*” as the main research material to further clarify Emperor Zhenzong’s advocacy for Taoism with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Keywords: Yuan Chen, Zhenzong of Song, Epigraphy/Jin shi, Taoism